

序

“盛世修志，千秋大业”，在绵阳市委、市政府和方志办等有关部门的关怀下，记载我市纺织工业发展历史的第一部专志《绵阳市纺织工业志》问世了。

绵阳纺织，源远流长。曾在唐诗、宋词中熠熠闪光，曾在民族危难之际产生了凝聚民族精神抗御外辱的“七·七”纺车。全国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绵阳纺织工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在资金积累、出口创汇、安排就业等方面，为绵阳经济的腾飞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志书正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翔实的资料，记述了勤劳聪慧的绵阳人，在这片生息的土地上，用辛勤的汗水和智慧，开发绵阳纺织的历史。充分展现了绵阳市纺织行业万余名职工团结奋斗、开拓进取，使绵阳的现代纺织工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衰到兴的曲折历程。

该志书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体，通观全书既可使我们总结出一些经验，也可使我们探索出一些规律，对我们了解历史，进行传统教育，研究行业规划，制定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战略，都将不无裨益。

李学思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路线，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进行编纂，力求做到思想性、材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力求反映棉纺织工业的历史与现状，本着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重点记叙建国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行业生产建设的成就及经验教训。

三、时间断限：上自公元一八九四年，下限一九九一年，个别史实有所突破。

四、结构：采用章、节、目层次，横排门类，竖写史实。

五、文体：采用语体文记叙体，运用志、记、传、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表录分别附于节、目之后。

六、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简称“建国前”，在采用旧纪年时注明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简称“建国后”，以公元纪年。省去“公元”二字。

七、资料来源：绵阳市档案馆、本局档案室、系统内各单位的厂志及厂史资料等。

八、编写范围：绵阳市现辖六县一市一区（即：三台、盐亭、梓潼、安县、平武、北川、江油市、绵阳市中区）的棉纺织工业。

概 述

绵阳纺织，源远流长。养蚕缫丝，始于炎、黄帝时期，盛于唐、宋时期。棉纺织手工业，始于唐、宋时期，盛于明、清时期。由于长期受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桎梏，发展极为缓慢。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入侵，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使绵阳的手工纺织业逐步向半机械化过渡，并成为绵阳近代民族工业的重要行业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绵阳纺织历经了由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转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重大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获得了全面快速发展。到1991年，全行业已初步形成了具有纺织、印染、针织、服装等门类齐全多功能配套发展的现代化纺织规模。成为绵阳市六大支柱产业之一。

一、1949年前缓慢的发展历程

唐、宋时期，绵阳的纺织业进入繁盛时期，棉纺织手工业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唐朝全国朝赋各类纺织原料和纺织品的“十道”中，就有剑南道和山南道的大部分地区。据《新唐书》记载，唐开元时贡锦产地就有绵州巴西郡（今绵阳），当时境内盐亭安家一带的丝织物“鹅绢”，曾一度为文人墨客写诗作画的上品。这一时期，盛唐诗人王维在《送梓州友人李使君》中曾有“汉女输潼布，巴人讼芋田”的诗句，说明当时绵阳境内种棉织布已相当普遍。宋时，蜀锦技艺更有长足进步，贡赋的织锦大部分由四川供给。在北宋太祖起至宋孝宗的二百多年间，四川每年上贡的锦绮等纺织品占全国诸路上贡数的75%，并在梓州（今三台）设立了官办绫绮工场。

宋、元时期，境内棉花种植及手工棉纺织技术逐渐普及，棉织业也逐步发展成为主要纺织行业，棉布渐次代替了麻纺织品，成为人们衣着的主要材料。到了明、清时期，境内的棉纺织业已进入

繁荣，当时三台县的乐安、古井、西平、盐亭县的黄甸、玉龙等地，几乎村村都有一苗头的手摇纺车和手持梭木织机，多为家庭劳作，三台的土纱本地用不完，还运销到成都、遂宁、重庆一带。但由于纺织工具原始，每日每部纺车纺纱仅 2 至 3 两。手持梭木织机，每日每台仅织窄幅土布 0.2 匹（一匹土布长 16 米，宽 0.4 米）。

清末民初，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渗透和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绵阳的手工棉纺织业开始向半机械化过渡。1894 年，三台县红星乡人周元龙，历经 10 余载苦心研制，以竹木等原料，制成了一台 10 苗头的人力足踏纺纱车（俗称大车，几经改进完善，于 1937 年 12 月由四川省建设厅定名为“七·七”纺车）。1911 年，境内三台县城西郊农民刘缙三，率先从成都购回铁木织机一架。人力足踏车和铁木织机的使用，使棉纺织单产水平得到了成倍提高。一部 20~30 苗头的纺纱车，每日可纺棉纱 2~3 市斤，一部铁木手丢梭织机，每日织布可达 0.5 疋以上。由此，以上两机很快就在境内得到了推广，并占领了棉纺织生产市场。至此手工纺纱、织布时代在绵阳境内开始衰落。

随着棉纺织业的发展，境内的印染业和针织业也开始走向繁荣。1913 年，三台县夏钰书等人，筹资购买手摇织袜机 5 部，在三台城关首开织袜作坊，主要产品有轮花袜、条花袜、夹底丝袜、蚕丝长统袜等。一人一天可织 20~30 双。到了 30 年代初，境内的绵阳、盐亭、江油、梓潼、安县等地的织袜作坊已陆续兴起。1920 年，境内的蓝靛染料年产已达二万余担，主产于彰明、江油等地，除当地留用外，还销往北川、西康、甘肃、云南、贵州等地，土靛印染作坊已遍及境内各乡镇。经过 40 余年的发展，在绵阳近代工业中，绵阳纺织已占据了重要地位。据《中国近代手工业资料》记载了“四川省府民国 25 年调查，全川生产土布者，已 47 县。兼有纺织者 33 县，……以纺纱为副业者，其占棉农产数百分比，以三台、盐亭、射洪、遂宁各县为较多，各占 30%~45%”。

抗日战争爆发后，导致了对外货（洋货）的抵制及国货的大量生产。为了促进生产，境内相继出现了大量的纺织合作社，以三台为盛，最多时（1939年）曾达 257 个，从业人员达 18 万人，占当时三台总人口的 30%。绵阳的魏城镇土纺土织也相当繁荣，1941 年，镇上计有 15 户人家专织土布，附近农村专门从事纺织业者已有 200 余户，每到闲日缝场，日上市土布成交量均在 2 万疋左右，土纱 5 万余斤。其中最负盛名的当数“魏布”——“坚牢、光亮、宽 1.2 尺，长 5 丈，重三斤，成为上市各种土布的标准开盘价，并成批销往青川、平武、甘肃、松潘等地，颇受顾客好评。

40 年代末，因战争影响和国民党的腐败，造成了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使境内棉田种植面积大量减少，造成了纺织原料短缺，生产资金紧张，多数纺织生产者纷纷停产或改行。据绵阳解放时（1950 年）资料记载。当时绵阳境内共有个体纺织专业生产户 2932 户，年产值 158.884 万元；个体针织专业户 86 户，年产值 8.490 万元；有纺纱机（车）11 万台，产纱 33 万市斤；有织布机 8500 余架，年产宽、窄幅土布 18 万余疋。加上农民兼营纺纱、织布者，从业人员约占境内总人口（330 万人）的 10%，产品一般为土纱、宽幅和窄幅土布、毛巾、蚊帐布、棉线袜及印花布等产品。

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绵阳纺织工业

1950 年绵阳解放后，人民政府曾根据广产棉花，交通方便及城乡从事手工棉纺织业者较多等有利因素，号召各地大规模组织及指导兴办各种形式的纺织业合作组织，积极推广当时较为先进的铁木足踏织机与多苗头足踏纺车及电动机器纺织技术。1950 年 8 月 31 日，在改造旧同业公会基础上，选举产生了新的工商联筹会，统一抓各地区的种棉及纺织工作，并根据“维持专业户，适当照顾主要副业户，压缩一般副业户”的原则，由政府贷款加以扶持，使境内棉纱、布的产量增长很快。1953 年全区共产棉花 49459 担，1954 年增长为 58552 担；1953 年全区产机纱、土纱共 14621 件，1954 年增

长为 15530 件；1953 年全区产机纱布、土纱布 199897 疋，1954 年仅机纱布就达 24911 疋，1955 年机纱布已达 30200 疋，当时境内从事纺织、针织的合作社及合作组已达 3069 个，从业人员已达 6005 人，年总产值已达 413.8 万元。

1954 年国家逐步加快了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提出了“积极引导 稳步发展”的方针，并通过“政治教育，典型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对粮、棉、油实行了统购统销，对纺织专业组织实行了计划供应。因此，从 1955 年开始，境内从事纺纱、织布的专业户日渐减少，并逐步向大规模的机器生产转化，以适应社会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

1956 年 5 月，境内棉纺织业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绵阳县针织厂由绵阳县新民袜厂和建棉袜厂合并而成，有手工织袜机 71 台，横机 1 台，园机 2 台，职工 80 人，主要生产各式棉线袜，到 1958 年底，又有 6 家小企业与之合并，成立了当时绵阳境内最大的纺织企业——地方国营绵阳县纺织厂，可进行制线、纺棉、织布、针织、漂染等多项生产。产品从单一的棉线袜增至宽幅布、手巾、毛巾、纱线、提花床单等近 20 个品种，职工人数达 443 人，虽然其技术设备仍处于半机械化状态，但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都得到了提高，充分体现了“合并小作坊，成立大企业”的优越性。到 1958 年底，全地区已有正规纺织企业 33 个，职工 10871 人，有布机 2047 台（其中：电动织机 26 台，铁木织机 2021 台）固定资产原值达 1128 万元，年产各支别纯棉纱 13601 件，棉布 547.66 万米，土窄布 273.94 万米，印染色布 54.28 万米，毛巾 29.56 万打，成为了解放后绵阳纺织工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60 年代初期，由于受连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农村棉花基本无收，加之小企业盲目发展，使轻纺工业原材料非常短缺。面对经济滑坡，社会购买力下降，1960 年底国家制定并实施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业八字方针，进行了大规模生产布局调整，压缩生产规

模，精减职工，并对一部分经营管理不善而造成亏损的企业实行了撤、并、停、转。原绵阳地区所属的国营纺织企业奉令停产，几千人的企业只留下 10% 的职工看守机器，其余职工除部分分散到其它企业外，绝大部分职工被退回农村或去平武采茶、伐木等，以挣钱保生活。此时的地方国营绵阳县针织厂也退至公私合营，并将以前合并来的几个加工厂分离出去，仅保留 60 余名职工从事手巾、鸡肠带、洗染、加工毛衣、折换领口和袖口之类的小商品生产和加工，产值、利润非常低下。1962 年底全地区整个国营纺织行业仅有职工 994 人，年产棉纱 341 吨、棉布 108.7 万米，实现总产值 103.1 万元，首次出现了全面亏损。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国民经济大调整，纺织行业经济秩序很快出现了好转。1963 年上半年，根据中央及省轻工业厅安排，行业内各企业陆续恢复生产。1964 年底，原绵阳地区辖区内国有纺织企业共生产棉纱 2098 吨、棉布 730.2 万米，印染布 114.7 万米，上缴税金 115.27 万元，创利润 129.68 万元。1965 年全行业各项经济指标比 1964 年又翻了一番，年产棉纱 4351 吨，棉布 1184.5 万米，实现工业总产值 2124.45 万元，利润 246.7 万元，上缴税金 115.27 万元。

年 10 月，现绵阳市境内规模最大的国有纺织企业——三台棉纺织厂（市一纺厂），经省轻工业厅、省建委（66）轻基字第 235 号文批准，正式开始筹建。

1966 年，全地区纺织工业刚刚有所发展，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又使趋于好转的经济形势开始受挫。1966 年全区纺织行业职工比 1965 年增加了 10%，但总产值却只有 980.4 万元，比 1965 年下降了 117%；实现利润只有 29.7 万元，仅为 1965 年的 12.5%。1968 年，全行业生产和经济效益继续下滑，产值仅为 1965 年的四分之一，并出现了全行业亏损，亏损额达 158.51 万元。此时系统内各厂生产时断时续，纪律松懈，管理混乱，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正置筹建中的三台棉纺织厂，更是成为了“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

史时期“少、慢、差、费”的典型工程，本应在两年内建成投产的项目，却拖了近 10 年，直到 1975 年 7 月才试车成功。从 1966 年到 1976 年的 10 年间，全区纺织行业基本上处于停滞的状态，按目前国有纺织行业统计，境内只有绵阳市针织厂和绵阳市第一纺织厂两家直属企业。1976 年底，全行业只有纱锭 15096 枚，自动布机 920 台，手摇针织横机 44 台，年产棉纱 1348 吨，棉布 620 万米，针织衫裤 5.73 万件，实现工业总产值 647.89 万元，创利润 13.86 万元，有职工 1604 人，有固定资产原值 409.45 万元。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给经受了 10 年动乱的绵阳纺织工业带来了生机，随着“一批两整顿”、“拨乱反正”工作的深入开展，及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余毒的彻底清除，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开始形成，使系统内各企业的生产、工作秩序很快得到了恢复。1978 年底，市一纺厂工程经地区轻化工业局组织的有关单位和专家进行竣工验收，达到合格标准，最终形成了纱锭 30192 枚，布机 952 台的生产规模。至此，全系统的固定资产原值已达 1443 万元，工业总产值已达 1107.3 万元，共产棉纱 2291 吨，棉布 859 万米，针织衫裤 22.64 万件，利税总额已达 159.84 万元，全区的动力机器棉纺织业和动力机器针织业已初具规模，基本上实现了由半机械化向动力机器化的过渡。

三、改革开放后全面发展的绵阳纺织工业

1979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全党工作重点的全面转移，随着“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对轻纺工业实行了原燃材料，电力供应，挖潜革新改造措施，基本建设，贷款、外汇及新技术引进，交通运输六优先的原则，促进了绵阳纺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从 1979 年到 1991 年的 13 年间，全行业年均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已达 24.38%，超过了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增长速度，固定资产投资达 13392 万元。改革开放以来全市纺织工业总投资完成了对市一纺织厂、市针织厂的技术改

造，先后新建了绵阳市印染厂、绵阳市第二纺织厂、江油棉纺织厂。转产改建了绵阳市经纬编厂和江油织布厂，引进了 4000 多万元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纺织、印染、针织设备 240 余台(套)。新增主要生产能力有纱锭 61140 枚，线锭 7224 枚，气流纺 1000 头，布机 1332 台，坯布印染生产线 4 条，针织印染生产线 5 条，经纬编机 121 台，使绵阳的纺织工业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工业行业。

自 1979 年开始，绵阳的纺织工业，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当年三月，经省府和地区行署批准，市一纺厂进入了省 100 个试点企业行列，执行以计划利润留成和超计划利润分成成为主要特点的省厅扩权 14 条。由于政府给予扩权试点企业在经济利益和自我发展方面一定的优惠政策，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推动了企业的技术改造，改善了职工的生活福利。从 1980 年起，国家实行建设资金有偿使用，基本建设拨款改为贷款的改革，又给予地方和企业一定的投资权，为多渠道筹集资金发展纺织工业提供了有利条件。1981 年下半年开始，全国纺织品市场出现由数量不足转为品种、质量不能满足需要的转折性变化，全行业抓住这一机遇，积极开发新产品，努力提高产品质量，使产值利税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利税总额已达 740 多万元。1982 年，政府将涤棉混纺布乃至纯棉纱布实行全面限产，而这一年开始进行的企业全面整顿综合治理，使全行业的生产管理水平和有效提高，逐步走上了制度化、规模化的轨道，其中市一纺厂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已达到全国“一档”标准。1983 年初，国家决定有升有降地调整纺织品价格，即调高纯棉产品价格，降低化纤和化纤纺织品价格，使纯棉和化纤产品的比价基本趋于合理。年底，国家公布取消实行了 30 年的棉布凭证限量供应办法，改革了商业体制，结束了纱布由国家商业部门统购统销制度，使企业由单纯生产型开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从而推进了纺织工业史上行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成为了绵阳纺织工业的新品种发展最快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绵阳纺织化纤混纺产品呈直线

上升，针织品也开始由纯棉向化纤、由内衣向外衣、由衣着向装饰等方面发展。

随着纺织行业发展中的大调整、大变化，企业的经营体制和领导体制也产生了巨大变革。1982年底，全行业推行了以盈亏包干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责任制。1983年到1984年，进而实行了“利改税”的改革。1985年，全系统开始全面推进了厂长负责制，并同时实行了第二步“利改税”。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到1987年底，全行业不同形式的经营承包目标责任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市纺织工业局代表市府分别对系统内各企业采取了“包死基数，超收分层”、“递增包干，超收全留”、“包干还贷”三种承包方式，一包4年。经营承包目标责任制的实施，使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进一步扩大，企业的法人地位得到了确立，政、企职能逐渐分离，企业成为名符其实的经济实体，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该项制度的实施，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使全系统的产值利税总额成倍增长，到1988年底，全系统利税总额已达1766万元，比1979年增长了12.5倍。自1988年后，全行业发展过程中结构不合理，配套不完善，产品档次低，缺乏竞争力等问题已初露弊端，到了1991年便出现了全行业亏损，行业内除棉纺织业利税405万元，针织，印染业亏损总额达828万元，使绵阳纺织工业跌入了低谷。

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使纺织工业发展，突出地表现为人才和技术的竞争，为了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改革开放以来，各企业在扩大生产能力，提高生产手段的同时，从职工政治、文化、技术培训入手，通过业余和脱产培训及专业学历培训等方法，使职工队伍的综合素质得到了普遍提高。在文化培训方面，自1979年以来，各企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对1968年至1980年初、高中实际水平未达到毕业程度的职工，进行了分期分批培训，到1991年底，全系统已有4800余人次参加了初中文化补习，300余人次参加了高中文化补习，通过补习，使全系统职工队

伍的文化素质得到了提高。在职业技术教育方面，1979年创办了地区纺织技工学校，到1991年，该校已向系统内各企业培养了1000余名中级技术工人。在职业技术培训方面，自1980年以来，各企业对未达三级技术水平的青壮年职工，分期分批进行了技术理论和应知应会的脱产补习，并坚持了经常性的职业技术培训和岗位练兵活动，到1991年底，全系统共有22159人次参加了各类专业技术培训，其中初级专业技术培训16865人次，中级专业技术培训5075人次，高级专业技术培训218人次，产生了省级以上操作能手近400余人，19人获得了技师职称。在职工政治思想教育方面，各单位始终作为一项重要的经常性工作，常抓不懈，从未间断。在坚持职工每周政治学习的同时，还根据各个时期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及上级安排，经常开展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政治轮训和培训，从1980年到1991年，全系统职工脱产政治培训或轮训已达25892人次，其中参加省级政治培训41人次，市级政治培训441人次，县级政治培训2572人次，企业政治培训22720人次。通过政治培训，使全系统职工的政治素质得到了提高，涌现出了一大批立足本职，乐于奉献，刻苦钻研技术业务，努力为四化建设建功立业的“四有”新人。到1991年底，全系统已有一名职工分别被评为全国“五一”劳动模范和纺织工业部劳动模范，二名职工被评为四川省劳动模范，19名职工被评为绵阳市劳动模范，44名职工被评为市纺织工业局劳动模范。在专业学历培训方面，全系统先后开办了电大、电视中专、函大教育班5个，共招收学员107人，在办班培养专业人才的同时，各企业每年都要根据人才需求，对口选送职工参加全国成人统考录取后到各大专院校脱产学习，或鼓励职工通过函授等形式自学成才。到1991年底，全系统已有267名生产、技术、业务骨干，分别到国家正规院校、省市党校、职大、职工中专等学校，进行了纺织工程、经济管理等等近20个专业的脱产学习，有420余名职工参加了全国各函授大、中专的10余个专业的学历学习，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回单位后都

成为了技术、业务管理骨干。到 1991 年底，全系统已有大中专毕业生 1000 多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已达职工总人数的 7% 其中获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的 3 人，获得中级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的 117 人，获得初级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的 592 人。专业技术队伍的扩大，职工综合素质的提高，“四有”职工队伍的壮大，为绵阳纺织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10 多年来，全行业已有近 500 项新技术得到了开发、应用和推广，20 余项产品及革新工艺填补了省、市空白。在技术攻关活动中，先后有四吸除尘、皮卷剥棉、纱疵、涌条自停、扎梭、双口喷射式烧毛、锅炉除尘等 30 余项获市以上科技成果奖，其中绵阳印染厂与中物院联合研制的电脑自动配色系统曾荣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在产品开发中，10 多年来，全系统已开发出了棉维混纺、棉涤混纺、棉麻混纺、涤麻混纺、人字呢、经编提花、毛圈、起绒、涤晴交织、涤盖棉、涤丝窗帘印花等新产品 400 多个，先后有“小白兔”童套装，经编提花装饰布、27.8 号纯棉纱、涤棉 13/14×96.5 印花布(金丝猴)涤棉 14/14“浮萍”印花布、涤麻 14/14×96.5 印花布等 120 余个产品。荣获了国家、部、省、市优质或优秀新产品奖。全行业的产品品种也由 1979 年的 50 多个增加到了 1991 年的 400 多个，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新产品投放市场，服用类、产业类、装饰类“三大领域”的纺织产品正在迅速增长。

新产品的开发与产品质量的提高，为门类众多的针纺织品走向市场创造了契机，建立销售网点，积极开展边贸和对外贸易等促销手段的实施，使绵阳纺织走向国内外市场成为现实。从 1983 年供销体制改革后，全系统各类纺织、印染、针织产品陆续销往全国各大中城市。其中市一纺厂的“兰风牌”纯棉普梳筒子纱等产品打入了香港和国际市场。市针织厂的“青色汗布罗领文化衫”、“纯棉印花童套装”、“罗领衬垫运动衫”、“特白棉毛长袖衫”等 10 多个产品远销荷兰、东德、西德、美国、苏联、日本、意大利及香港等 20 多个

国家和地区，该厂并于 1987 年 12 月被省计经委和省外贸厅命名为“出口商品生产专业厂”。1989 年，全系统产品外贸出口额达 842.23 万元，成为了绵阳纺织工业出口创汇第一高峰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是绵阳纺织工业发展最快的时期，到 1991 年底，全系统的企事业单位已达 9 个，有纱锭 91432 枚，线锭 7224 枚，气流纺 1000 头，精梳机 4 套，布机 2284 台，坯布染色生产线两条，坯布印花生产线两套，台车 15 台，棉毛机 36 台，大圆机 10 台，经编机 42 台，针织印花生产线两条，电脑乡花生产线一条，染色机 19 台套。职工总人数已达 9389 人，年产纱已达 7907 吨，布 4082 万米，印染布 1929 万米，针织面料 485 吨，针织服装 201.08 万件，实现工业总产值 23645 万元，创汇 599.57 万元。从 1979 年到 1991 年，全系统累计实现利润 12334.34 万元，为美化人们的生活，为绵阳的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

四、发展中的问题与差距

在行业管理方面，绵阳纺织工业的行业管理分别由市纺织工业局、市丝绸总公司、市二轻工业局、市乡镇企业局四个主管部门，按企业性质进行归口管理。行业发展规划，产品开发及生产协调等工作，都只能在其行政管理的范围内进行。其发展规模与速度及整体素质的提高等方面，都将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对全行业实施全面协调及发展战略，充分集中技术、设备、资金、原材料、人才、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极为不利。

在产业结构方面，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全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达 24.38%，并克服了发展不配套等状况，使生产能力从总量上有了很大提高，但忽视了后整理、深加工等高新纺织产业的开发和投资。大部分仍然是中、低技术项目或重复项目，产业结构与市场发展不适应，无力参与市场竞争，这种弊端，到了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便充分暴露出来了。

在产品结构方面，由于较长时期内，全行业的产品结构属中、低

档水平，且花色品种少，这便成为了绵阳纺织工业生产中的痼疾。近年来，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消费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中低档纺织、针织品市场越来越小，加上省内长期供大于销，使绵阳纺织工业的处境更为严峻。

在经济效益方面，纺织工业的经济效益和纺织品消费的社会效益呈现出相悖发展的趋势。由于人民政府坚持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上的剪刀差，采取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稳定工业品价格的政策，从 1950 年到 1991 年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提高了 5 倍，年均增长 5% 以上，而白布的零售价只提高了 60% 年均增长 1.2%。大大低于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总指数。由于大幅度缩小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棉花多次提价，加上 80 年代初利润较好的化纤及化纤混纺产品大幅度地调低售价，至使纺织工业利润明显下降。到了 1985 年以后，全国纺织品市场产大于销，市场疲软，中低档产品积压，工厂亏损等现象更为突出。

以上存在的问题，是前进中的暂时困难。要摆脱困境，只有在继续深化改革中，积极发展集约型规模经济，不断克服产业、产品结构不合理，设备落后，产品档次低，市场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在品种、质量、效益上闯出新路，才能使全市纺织工业在新的历史时期上一个新台阶。

大事记

清光绪二十年（1894 年）

春，三台县红星乡人周元龙，致力于纺纱车的研制，以竹、木等作材料，历经十余载苦心研制，一台可纺 10 苗头的人力脚踏纺纱车雏型问世。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

4 月，陈宛溪创办木机缫丝的神农丝厂在三台县万安寺正式开工。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

是年，四川省劝业道道台周孝怀，积极推广植棉技术，从江苏南通购回改良棉种 2000 斤，分送射洪、三台、遂宁等产棉县。

清宣统三年（1911 年）

夏，三台县城西郊刘镒三首次从成都购回铁木织布机一部。

民国 2 年（1913 年）

邑人夏钰书、冯成修、黄心田三人在三台县城首开织袜业务。

民国 3 年（1914 年）

夏，绵阳、江油、梓潼、三台、安县城区缝纫店，从成都等地购回脚踏缝纫机，开创了全市缝纫业使用机器加工的历史。

民国 5 年（1916 年）

春，三台县脚踏纺纱车发明者周元龙之子周岳生等人，将能纺 20 苗头的人力脚踏纺纱车完善后投入批量生产。每部车每人一天可纺棉纱 1.5~2 斤，较手摇纺车前进了一大步，工效成倍提高。

民国 8 年（1919 年）

6 月，在棉纺织业的推动下，绵阳、三台、盐亭、安县等地的织袜业开始采用手摇织袜机生产线袜。

民国 9 年（1920 年）

彰明县（现合并于江油市）以当地草本植物制造传统染料蓝靛，年产量达二千担，供省内各县染土布之用。

民国 17 年（1928 年）

三台县古井乡市场开始有一妇女织出土纱花布出售。

民国 18 年（1929 年）

5 月，三台红星乡周明伦将完善其父周元龙研制的 20 苗头脚踏纺纱车送至成都参加《四川省第一次国货展览会》，获头等奖。

民国 19 年（1930 年）

周元龙之子岳生、贯亏、莱顺、明伦兄弟四人，用自制的脚踏纺纱车 40 余部，收徒 50 余人，在家开办“民生纱厂”。

是年，盐亭赵守成以本地会馆为厂址，建立了盐亭民生工厂。经营纺纱、织布、织毛巾、蚊帐等。

民国 23 年（1934 年）

绵阳刘俊成在绵阳北街开设大吉祥袜铺，雇学员 3 人，有手摇袜机 3 台，产品有长统、短统、套袜三个品种。

民国 26 年（1937 年）

12 月，四川省建设厅将三台周氏研制成功的 20 苗头人力脚踏纺纱车更名为“七七纺纱车”。以激励人民抗日救国之雄心壮志。

是年，四川省合作委员会派鲍发清到三台县政府设置合作指导员办事处。

民国 27 年（1938 年）

四川省棉纺织推广委员会派刘仲融到三台设办棉纺织推广区。